儒学的普世性问题研究

苗润田*

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它不仅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许多方面产生过深刻影响，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和稳定起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还远播海外，影响广泛，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儒学的许多内容已超越了时代与民族的限制而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一种极为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有关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亦即其普时性、普世性问题，学者们已作了大量的研究和阐发，本文的立意不是重述这些看法，具体说明儒学在哪些方面具有普时性、普世性，而是想说明它为什么具有普时性、普世性，以求对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一

儒学即儒家之学亦即儒家的学说或思想体系。“儒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淮南子·要略》有‘孔子修成康之道,述

*苗润田，中国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教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的说法，这里的“儒者之学”即指儒学。稍后，人们便把‘儒者之学’浓缩为‘儒学’。《史记·五宗世家》‘:(河间献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又《汉书·艺文志》‘: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效者。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也。”又《后汉书·伏湛传》‘:累世儒学,素拣名信,经明行修,通达国政。’这些论述均使用了“儒学”一词。后来的新旧《唐书》、《元史》等都有《儒学列传》或《儒学传》‘;儒学’概念被广泛使用。

儒家之学与时俱进，绵延两千多年，经历了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等不同的思想形态。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学的内容、结构、功能也在不断变化。汉唐儒学不同于原始儒学（先秦儒学），宋明理学不同于汉唐儒学，当代新儒学也不同于宋明理学。可以说，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儒学。不仅如此，即使是同一时期的儒学，也由于儒家学人的不同而各有其独特的思想风貌。孟荀的儒学不同于孔学，而孟荀在对孔子之学的认识和发挥方面，在儒学体系的建构方面，在理论动机和目的、思想重心和倾向等方面，也都存在很大不同。宋明儒学中，心学不同于理学，而无论是在心学内部还是在理学内部，不同的儒家学者也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十分显著。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儒家学者也往往会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认识，比如知行的先后、难易问题，就有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难行易、行易知难等各种不同看法，这是大家所熟知的。正因为有差别、不同，也才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才有其在中国儒学

史、学术史上的显赫地位。

不过，这种差异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古人有“同异交得”之说，这话很有道理也合乎客观实际。因为“异”不是一个自在之物，它总是与“同”相联系、相依存而存在的；“异”之所以是“异”乃是因为有“同”；“异”是“同”中之异，只有在与“同”的相互联结上，“异”才能获得自身的规定性。这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时代，也无论是何种形态，无论是什么样的学者，只要它是“儒家”的，那么其思想、学说、理论就有一个“儒家”的共性或儒学的一般；不断变化、与时俱进、不同形态的儒学之中有其“不变”的、相对稳定的内容。依前人的说法，大凡“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序)人伦，是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庄子·渔父》)“游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者，都属儒家、儒者之列。后世之儒者，虽然未必都把尧、舜、文、武视为效法的典范和理想人格，但无疑都以孔子为宗师，以孔子思想为行动的指南，致力于《六经》的诠释、研究，关注于仁义道德问题，重视礼仪教化，强调人际和谐，维护纲常伦理。这就是儒家之学。儒学在孔子创立之后，经历代儒家学者的不断充实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内圣外王、修己治人为主旨，由仁、义、礼、智、信、天人、道器、心物、知行、性命、中庸等一系列概念和范畴，以及“天人合一”、“下学上达”、“执两用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知先行后”、“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之用和为贵”、“万物皆备于我”、“为政以德”、“博施济众”、“和为贵”等一系列命题、论

断、原理构成的庞大的知识体系和理论系统。这就是儒学。

二

任何思想、学说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每个时代的思想家、理论家，总是面对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为了解决他们那个时代的矛盾，而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理论学说的。因而，任何思想、学说都具有时代性和历史的局限性。古人有古人的时代性与局限性，今人有今人的时代性与局限性。人们不可能穷尽真理，而只能不断地认识真理、发现真理。人类思想的发展与延伸，也就是一个不断地吸收、丰富、完善和拓展已有思想认识的过程。儒学是儒家学者在特定历史环境、境遇下以特有的话语形式来面对、思考和表达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因而，儒学也有其时代性和历史的局限性。这是毋庸讳言的。

但是，在人类思想发展的长河中，在人类精神的百花园中，有些思想、学说如流星闪烁，飘忽即失，一闪而过；有些思想、学说却影响持久而广泛，具有某种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在中国思想史上，在“处士横议，百家异说”的先秦时代，诸说繁纷，各种理论相互激荡，各种思想层出不穷，各种学派林立，但是，这其中有些思想、学说、学派如昙花一现，在人类思想史上匆匆而过，很快便进入了历史的博物馆，而有些思想、学说、学派却如恒星闪烁，超越时代而深刻影响人们的思想乃至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儒学与墨学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虽然墨学与儒学同为先秦之“显学”，且墨学是在批判儒学中形成的，但在秦汉以后，墨学便逐渐湮没，其“合理内容”为其他学说所融摄、吸收，从而失去其独立存在的意

义。与之相反，儒学则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历时两千多年而仍然被认为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宝贵资源，“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① “儒学传统用于技术、商业和政府服务于人民的优良本质已表明，它将是21世纪潜在的新准则，这不仅对那些拥有儒学传统的人们，对全世界也是如此”。（李瑞智、黎华伦：《儒学的复兴》，范道丰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9页）这都是对儒学现代价值的正面肯定。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讨论孔子思想、儒学的现代意义，无论是持何种观点，是肯定还是否定，是倡扬还是批判，都这样或那样的肯定了儒学的不可逾越性亦即其现代价值。儒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值呢？

一般说来，价值是事物（物质的或精神的现象）对人的需要的某种有用性，亦即对个人、群体、社会和整个人类的生活和活动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一种事物或现象，由于具有一定的属性和性能，能够满足主体的某种（物质或精神的）需要，这种事物对于主体就具有积极的肯定的意义，就被主体认为是有用的，即有价值的。反之，如果一种事物或现象，由于其所特有的属性或性能，不仅不能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甚至妨碍主体实现某种需要，这种事物对主体就具有消极的否定的意义，就被主体认为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即无价值的。一种对于主体有用即有价值的东西，其有用的程度越高，满足主体的范围越广，这种东西的价值也就越大；反之，价值就越小。价值有具体价值与普遍价值、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实践价值与理论价值、隐性（潜在）价值与显性价值、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以及审美价值、伦理价值、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军事价值、宗教价值、个人价值与群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价值和社会价值、人的价值和物的价值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无论表现形式怎样，其实质都将是对主体某种需要的满足，这就是价值、意义。

儒学之所以在今天、在现代仍然具有巨大价值，之所以在今天仍然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弘扬或批判的对象，也正是因为它对人的需要而言具有某种有用性，对个人、群体、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生活和活动具有积极的意义。问题在于，它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意义？为什么能够满足人的、人类的、现时代的某种需要？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

不可否认，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有着质的区别，诚如韩非所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和习俗，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要求；时代不同，各个时代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不应是一样的。

然而，历史发展又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古今前后一也。”（《吕氏春秋·长见》）任何时代都有一些跨时代的、贯通古今的矛盾和问题，不同时代之间又有其内在的一致性。自人类产生以来就有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的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关系问题，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战争与和平、生与死、荣与辱、痛苦与欢乐的关系问题等等。虽然这些问题在不同时代、不同历

史条件下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或是将来，它们都普遍存在并将继续存在，都是人类无法回避、应当面对和必须面对的问题。告子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这是人之常情，也可以认为是人的天性。如何分析、评价这种观点，我们暂且不说，这句话无疑提出了一个关涉人类的重大问题，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起码条件。庄子说“：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庄子·知北游》）哀乐之情与生俱来而人不能却，且“人之生也，与忧惧生”（《庄子·至乐》），人的一生始终与忧愁相伴。不仅如此，人“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庄子·齐物论》）人的生命旅程充满了苦痛“：富者，苦力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外矣”；贵者，夜以继日，日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烈士为天下见善矣，而未足以活身”（《庄子·至乐》）。简而言之，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是尊贵者还是卑贱者，都无法逃遁人生痛苦的缠绕。佛教有“四谛”说，“苦谛”是其中最根本的一谛，它认为人的出生是痛苦，年老是痛苦，死亡是痛苦，与不爱的人相聚是痛苦，和相爱的人分离是痛苦，欲望得不到满足还是痛苦。总之，人的生命、生活就是痛苦，人生在世处处皆苦，苦海无边。19世纪中叶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如果我们对人生作整体的考察，如果我们只强调它的最基本方面，那它实际上总是一场悲剧，只有在细节上才有戏剧的意味。”（《叔本华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生命整个儿地根本就是痛苦，它是和痛苦分不开的”；每一部分生命史就是痛苦史”（《西方现代资产阶级

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 年版，第 13 页)。在他看来，人生是痛苦，世界是地狱。因为人的本质是自我生存意志的冲动，生存意志也就是一种生存欲望，而欲望的本身就是不满足或匮乏感。人的追求永无止境，人总有需要和欲望，需要和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必然产生痛苦；而得到满足就会感到无聊、疲惫，这也是痛苦。况且，欲望的满足是暂时的、有限的，一种欲望满足了，随之而来的又是新的欲望。这样，层出不穷的欲望就永远无法得到满足，从而使人陷入永远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即使欲望得到完全的满足，也不能摆脱痛苦，因为一个人的所有欲望都满足，没欲望了，那他就会感到孤寂、空虚、厌倦，这同样也是痛苦。所以，结论是：人生等于痛苦。我们这里不讨论这些理论的正确与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理论触及了每个时代的人都必须面对的痛苦与欢乐的人生矛盾，而且这一矛盾的确是与人的整个一生相始终的；并且，这些学说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人生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理论仍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

不同时代、不同历史境遇下的人们对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矛盾和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为此所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法、措施、理论，既具有具体性、历史性，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超时代性。即使是那些在后人看来是错误的认识，也并非全是人类精神的垃圾，仍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因为它可以为人们正确认识那些问题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料；而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更具有超时代的价值，包含着恒久、恒常的生命力。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如此，对社会的认识是如此，对自身的认识也是如此。自然科学中各种定理、规律的发现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中各种原理、规律的发现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

上说，任何基于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与矛盾而形成的思想、理论都有其普遍的和超时空价值的一面。儒学之所以具有普遍的和超时空的价值，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这也就是因为它以自己的方式、方法，理论地解答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群与己、古与今、知与行、义与利、生与死、荣与辱、苦与乐、德与刑、善与恶等这样一些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与矛盾，从而为人们正确认识、处理这些问题提供了必要、充分的思想资料。比如儒家主张做人要“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信必成之”（《论语·卫灵公》）；“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思想无论在什么时代对人们正确处理人际关系都是有益的。

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命运及其价值的大小，都是以其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的程度如何而定的。在人类思想史上，许多思想学说也都理论地解答了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与矛盾，但是它们的命运却很是不同，有些思想、学说、学派如昙花一现，在人类思想史上匆匆而过，而有些思想、学说却如恒星闪烁，超越时代而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想乃至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满足人和社会需要的程度不同。在中国先秦思想史上，名家学者适应战国中期社会新旧交替过程中所产生的调整名实关系重新统一思想的需要，以及学术争鸣中锻炼理论武器的要求，专注于名实关系的考察，着意于概念、命题的辨析，致力于判断、推理等逻辑问题的研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实理论。名家的名辩理论以其较高的思辨水平促进了中国古代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发展，具有较高的思想理论价值。但是，虽然名实关系也是

一个带有普遍性、超时空性的问题，名家学者辨名析理的初衷和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因‘名位失守’、‘名实相怨’而引发的社会治乱问题；然而，他们的辩说纯理论的色彩相对说来较浓，如其‘坚白’、‘同异’之辩及‘卵有毛’、‘鸡三足’、‘火不热”等所谓“辩者二十一事”，这些论题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不太紧密，因而其实际意义亦即社会的影响力、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不是很高，所以当时的许多学者对此非议颇多。荀子指出，“坚白同异”之类的辩论虽然很明察，但君子不参加，因为对此类问题“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荀子·儒效》）名家“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急，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荀子·非十二子》）喜欢搞怪僻的学说和奇异的言辞，虽然分析的很透彻，但不是人们迫切需要的东西；辨得很巧妙，却没有实际用处；费事很多，而收到的效果却很少，不能用来治理国家的纲纪。鲁仲连也认为，思想理论的功用就在于能够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给社会需要以理论的满足，判断一个思想家‘优’、‘劣’的标准，衡量思想理论的价值尺度即在于此。因此，他斥责辩者田巴：“夫危不能为安，亡不能为存，则无为贵学士矣！”(《史记正义》引《鲁仲连子》)认为田巴的‘坚白’、‘同异”之辨‘有若枭鸣，出声而人恶之”。(同上)有鉴于此，名辩理论的‘合理内容’被其他学派吸收、融摄之后，便失去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名家的命运便终结了。魏晋玄学所讨论的‘有无’、‘本末’、‘体用’、“动静’、‘一多’等论题，也是一些带有普遍性、超时空性的问题，但由于玄学偏于抽象地论证“礼法名教合于天道自然”，

这种清谈的玄理虚无缥缈，莫测高深，其传播、影响仅限于社会的文化层而无法在整个社会广泛流传，因而它也不能充分地满足社会的理论需求而为佛教所融摄。显然，只是理论地说明一些带有普遍性、超时空性的问题而不能充分地满足社会的理论需要，其思想理论也就不具有普遍的和超时空的价值。

儒学之所以具有普遍的和超时空的价值，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其原因不仅在于它理论地解答了一些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与矛盾，更重要的还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给予社会需要以理论的满足。在先秦思想史上，儒家虽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儒学只是百家之学中的一学，孔孟之学曾被视为“迂阔”而不见用于当世，道、墨、法诸家对儒家之学进行了激烈地批判，但在诸子百家中，儒家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一家，是“世之显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适应汉代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封建统治者积极“有为”、全面“更化”的要求，汉代统治者辨别利弊、比较得失，经董仲舒的大力策动，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的这种由“私学”而“官学”、由“官学”而“国学”的变迁说明，一方面它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需要，有益于社会的更化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需要儒学。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在保持其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基本原理不变的前提下，不断丰富和更新着自身的思想内容和理论形态，以满足不同社会的理论需要，从而保持其持久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儒学之所以具有普世性，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之所以能够给社会需要以理论的满足，这与儒学自身的性质和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点、理论指向或理论重心密切相关。儒学是一种经世致用之学，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解决现实的社会与人生问题当作从事学术的终极目的，把追求“内圣外王”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境界，而反对佛老的“空寂”和“虚无”，反对纯学理的思辨，反对“徒明不行”、“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只在知上讨分晓”（王阳明），主张“修己以治人”；“修己以安百姓”（孔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追求“明体达用”；“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吕祖谦）；“明道、稽政、志在天下”的“经世之学”（王廷相）。先秦儒者对名家的批评，汉代王充对“虚妄之言”的抨击，宋儒对佛老“空虚之学”的批判，明清儒者对理学与心学末流的讨伐，都是以“崇实黜虚”、“救世济时”，希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为旨归的。所以，明儒王畿指出：“儒者之学，务为经世。学不足以经世，非儒也。吾人置此身于天地之间，本不容以退托。其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固儒者经世事也。”（《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致思倾向和理论追求，儒家学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群与己、古与今、知与行、义与利、生与死、荣与辱、苦与乐、德与刑、善与恶、治乱等这样一些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理论回答，从而给社会需要以理论的满足，显现了自身的持久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儒学之所以具有普遍的和超时空的价值，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还在于“它包含着许多人生和社会常道，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为人性的改善和社会的改良所必需，也就是古语所说‘道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也’。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能

提供西方文化所缺乏的东方智慧，这些智慧恰恰是全人类克服种种社会危机、健康地迈向下一个世纪所十分需要的。(牟钟鉴：《走进中国精神》，华文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8 页）很难理解，一种对人、对社会、对民族毫无益处的思想学说能超时代地传承下来，一种对人类毫无益处的思想学说能够超越民族的限制而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一种极为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儒家的"有教无类"、"仁者爱人"、"诚实守信"、"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思想，已经超越了时代与民族的限制而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一种极为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

注释：

①这段文字，原本被认为是 1988 年 1 月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巴黎，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巴黎宣言中的一句话。近年来，研究者对这句话的出处、真实性多有争议。笔者以为，这句话是否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所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道出了人们的一种文化祈求，反映了人们对孔子之学的价值认识，这种认识本身是合理、可取的。

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与儒教思想

吴锡源 *

支配今天世界的现代社会理念，可以说是文艺复兴以后出现的西欧近代社会合理主义精神。在合理主义思想上，将物质与精神、个人与集团、人类与自然等相异的两个价值及概念视为综合的、互补的相待关系之观点，远不如将之视为分析的、对立的关系来得普遍。这种分析性的合理主义精神，固然促进了科学的思考，但是依据二分法思考的合理主义，也因排他性的两极逻辑概念，逐渐产生了社会上的纠纷与斗争问题。

人是具备精神与肉体的存在。可是观诸现代社会一般人的价值观，却是轻忽精神上的需求以及道德上的价值，他们普遍将肉体上的欲求以及物质上的价值列为优先，积极地去追求。以经济实力为主的价值观带来产业、科学和医疗技术等的惊人发展，同时在物质的富饶及人类的福祉上也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是，以物质为优先的价值观相对地也减弱了人类精神上的道德性，同时丧失了人的尊严性。而且由于对物质永无止境的欲求，人们不择手段地争相获取更多的物质，因而引发了社会不正非理的乃至暴力杀人的事件等病态现象。

*吴锡源，韩国成均馆大学儒学东洋学部教授

人是个人的存在，同时又是社会的存在。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所注重的，与其说是共同体的社会，不如说是个体的个人问题。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意识，促使人权获得伸张与自由得以扩大，尤其是物质文明划时代的发达进步。把人类从沉重的劳动中解放开来，使其因空闲时间的增多，获得了发展个性及实现自我的机会。但是这种自由若不根基在责任意识上，容易形成无限的放任主义。忽视共同体意识的话，将会固执着个人的利己主义。同时，一旦丧失健全而均衡的思考之时，将会沦落为盲目的斗争主义和集团的利己主义。

人类不仅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也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西欧近代的合理主义精神就站在接受事实的立场，以科学的方法分析一切存在。这种现代社会的机械论自然观以合理的思考为其根干，持续地开发技术，而成就了今天物质文明的发达。但很遗憾的，它并不是单纯地为了维持人类基本生存而开发自然，它反而是本着人类优越的意识，为满足人类无限的物欲，恣意破坏自然现象，造成环境污染，几已到达极致状态，甚至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

儒教设定了相当于肉体的物质价值概念为利。义的价值是以分辨是非的道德价值判断为其中心课题，那么利的价值就是以计较得失的物质价值判断为其根据。论辨是与非是判断道德价值即善恶的行为，具有动机主义的倾向，计较得与失是判断物质价值即利害的行为，具有结果主义的倾向，此为其特征。因此，具体的现实情况中，义和利的本质相异，所以有相互纠纷的关系。

儒教的人性观以调和实现人的物质价值和道德价值为其理想。也就是说，在强调精神的道德价值观时，也应适当地添加

物质价值；强调物质价值观时，也要充分地补充道德价值。像这样两个价值对立的时候，儒教强调的是追求以义理为其根基的利益。因为假如所有人都无视义理只顾求取利益的话，必将发生争夺，其结果不仅是个人，连国家都可能遭致灭亡。因此，孔子说“见利思义”，《大学》也讲“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儒教的社会观警惕人不要偏向个人或社会的任何一方，孟子在当时无数的诸子百家中，惟独批判杨朱和墨翟，这是因为杨朱的为我主义太过偏向于个人主义，墨翟的兼爱主义又太过偏向社会主义。如果像墨子的主张一样，只强调全体的社会性，将造成无差别的平等主义；如果按照杨朱的主张，只强调个别的个人性，将倾向于差别的个人主义。朱子以理一和分殊的命题说明人类存在的全体和个别的关系。如此看来，儒教社会观的本质就是以人的责任意识为基础的个人主义，也就是最大限度认定个人的自律性，而强调与人类社会的共同体意识，以达到调和的价值意识。

儒教的自然观了解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秩序中的一个存在，而且又把自然本身视为一种生命体。对人与自然间调和的关系，《中庸》说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又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像这样，儒教的自然观可以说就是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尊重自然的秩序和生命，以达到人与自然间调和的价值意识。

人本质上是物质利欲冲动得很强，精神道德发扬得很弱的存在。于是，在物质利欲的倾向里出现价值强弱的问题，在道德义理的倾向里出现价值高低的问题。亦即，道德高的价值不易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体验，相反的，道德低的价值却容易体验

出来。因此，《书经》中说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然而，现实上却很难克制容易强烈体验得到的肉体欲求，因此，孔子强调义勇，以使人有坚强的实践意志。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必须回归到具有真实意味，指向人道化的社会，而且和平共存的世界。新方向的课题可谓是以道德性为根基的物质追求，以共同体意识和责任意识为基盘的个人主义，以及与自然共存和维持亲和关系的人道主义。尤其是在产业化过程中，因物质万能主义而遭致道德性危机状况的现代社会里，必须补充儒教思想所强调的道德主体性，大同社会指向的共同体，和平共存的中庸思想，而且创造出新的理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